



希望文学丛书



湮没

韩 蕊 丽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2 035 7972 4



韩 葛 丽

湮 没

• 希望文学丛书 •

湮 没

韩 蕙 丽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一 厂

787×1092 毫米

32 开本

8.25 印张

157,000 字

1984 年 8 月第 1 版

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00,000

书 号：10326·7

定价：0.95 元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

韩 蕊 丽

“明天我就动身……”

——读韩蔼丽小说集

林斤澜

一九七八年，我才从浩劫里走出来，回到收拾起残局的文艺队伍，还没有来得及凭吊废墟吧，猛然间，新人成批地涌现在阵地上，老兵们也连忙拾起旧刀枪。不料有的作品一出现，就是一个轰动。反映的强烈，经常不能比拟。人们也就借用本来形容社会新闻、号外消息的词儿：爆炸性，安在文学作品身上。

现在——不过三五年工夫吧，大家冷静下来，把那一阵儿叫做“井喷”时期。古人“文思泉涌”四个字，本来是挺牛气的，现在嫌它“田园风光”了，何如“井喷”的气概，意味着多少年的埋藏，多少个压力。不过，那究竟不是常态。若光说爆炸，不论是弹还是爆竹，炸完以后，不是自身也烟消火灭了吗！

一九七九年，正是“井喷”万丈的时候，九月，《北

京文艺》出的是小说专号，一看目录，有新人新作栏，打头的一篇题名《湮没》，作者韩蔼丽。不觉笑起来，这个新人，在我可是老熟人了。

我读《湮没》，被不能湮没的时代悲剧感动。五七年的悲剧，扣在老革命老专家头上，叫人悲愤；让一些小青年摊着，往往透着悲凉。小说里的一对青年，在火车上认识，在火车上永别。认识的车上，那“初出茅庐”的眼睛，那朦胧的诗情，那充大人的举止，勾起我醇酒般的记忆，酒是窖存越久，越香越醉人。到了永别的车上，那没有长足就长老了的心灵，那忍辱负重，那人为了牺牲，那加码的沧桑……写来有疏密，有起伏，有露有藏，有似俗又脱俗。仿佛纸上燃烧着蓝色的火焰——叫人觉着阴森，但又是火焰。后一趟车上，我想是全篇最感染人的地方。

我想去看看她，进门就指着脑门说，千里马常有，伯乐难得。相处多年，竟不发现。（何必如此做作。）那么控诉控诉浩劫吧，焚书坑儒吧。（当时每会必诉，何必业余加班儿。）那么议论一番世上后浪催前浪，新人新作栏，胜过老人老作一筹。（何必站着说话不腰疼）……但是什么也不表示，又心里沉甸甸地不乐意。折中一下吧，发个贺电如何？贺电是洋的，同住一城还发电，洋加一倍。再折中一下，写成电报形式，邮寄了去。

电报中有文如其人的话，读了她后来的作品，觉得这句话落了俗套，其实不确切。

《湮没》引起一些同行的注意，有人因我混迹京都的时间较长，向我打听作者的根由。但在社会上，好象没有“爆炸”。以后韩蔼丽一鼓作气，接二连三发表新作：《米兰，我的……》《眸子》《父亲》《A角》《田园》……女作家的专刊、专集、专评里也有她了，但是怎么“爆炸”过，还是没有吧。在“井喷”的年头，比起别人来，她的鼓点子不算紧密，但以她得过癌症的羸弱体格，也够难为她了。

现在要收集出书，让我重读一些作品，倒不用担心一经“爆炸”，剩下的不多。好比《湮没》，那是经看的。在火车上认识，那朦胧的真情，使细碎不至于琐碎。又在火车上生离死别，那坎坷的真情，也使出奇不落入离奇。在艺术里，真情好比雪天，好比月夜，就在杂乱的，贫穷的，愁苦的原地，魔术般，给我们一个优美的世界。有回在一个讨论会上，大家这个主义那个流派说了许多话，一位博览的和我同时代的女作家，轻悄悄地，可是肯定无疑地跟我说，艺术没有别的，唯有真情。

韩蔼丽常写她的女友，同学，她最熟悉的生活圈子，自己也掺合进去了的遭遇。她凭真情写作。写法是率直说出来，有多少说多少，说到哪儿算哪儿，随处可以有倒叙，随时会岔开又拉回来。这种写法当然是第一人称最方便，因此哪儿都有个“我”，这个“我”或是南方人或北方，或男或女，但大都善良又清高，随和又别有固执，没有城府又隐隐有所追求。

因此我说了文如其人的话。

韩蕩丽五十年代后期，从上海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。但我认识她，贯穿着整个“浩劫”。起初，她大学毕业不久，在老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，天然的是“造反派”，忽然又“保皇”，路见不平，拔“舌”相助。上海姑娘说北京话，嘴皮子飞快。近视眼又不戴眼镜，对方的表情模模糊糊，索性只顾说只顾说。对方不屑辩论，蔫溜了，她还在说还在说。这样的時候不是没有过的。

忽然，她家被抄。我们还没有轮上，她倒先走一步。当时觉着荒唐，其实这才是开始，一个赛过一个的荒唐拥挤而来了。又是忽然，她成了“5 1 6”家属，连个平安家信也不可得。她的身体垮下来了，出现过“癔症”景象。幸好到后来，所谓“5 1 6”原是虚妄。这中间她好象也没有傻待着，我有两个印象，一个是寻丝觅缝，也央告也说厉害话，搜索那烧剩的封存的翻译小说，再一个还是爱说，不过说的多半是鲁迅先生形容的，“愚不可及的疯话”了。

我觉着不全是文如其人。

她那里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吧。《湮没》里是不是浓了，《米兰》和《田园》里也重了。她有为有所不为，但都是率直的。《眸子》和《A角》里，却拐弯抹角飘散着哲理探讨。

她的写法是靠近散文的路数。这条路上有大手笔、有高手。在散又不散上下功夫，要扯远拉开，要左右杂陈，要不拘前后，仿佛信笔“散”下来。但处处又仿佛有个

“焦点”在，所有的光都投射在这个“焦点”上，或者从这个“焦点”散发出去。

什么是“焦点”？是不是就是主题的意思，我想避开主题两个字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把主题说得十分具体，例如“反对彩礼”“只生一个孩子”“调整领导班子”……高尔基有几句话说：

“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，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，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，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，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——赋予它一个形式。”

译文总是拗口一些吧，不过有几个词很让人琢磨，如“暗示”“还未形成”“唤起……欲望”。

散又不散的道理，在于有个内涵的东西，不管这个东西叫个什么名儿。在高手笔下，这东西处处存在，又始终不露痕迹。

这一种写法，还往往甩掉过场、过度、过程，看来信笔挥洒，其实净给人一个个独特的镜头。一个短篇，能掏干了多少年的积累。要有许多零碎，还要舍得给。我曾见一位老作家挣红了脸，可嗓子嚷道：

“这几个短篇，是牺牲了一个长篇写的呀。”

现在的道路是宽广的。在我们祖国的高天厚地上，常常看见庞大的联合收割机，灵巧的手扶拖拉机，带有传统威风的马拉大车，可能是诸葛亮发明的独轮小车，一起在田野上活动，各有各的活干。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儿，活儿跟

活儿有多么的不一样，处处需要创新的手，时时需要独特的招儿。俗话说：“船多不碍港，车多不碍路。”岂止不碍，其实是繁荣景象。

谁也不用挤兑谁吧，这也不是谁踩了谁，谁顶谁的事儿，大家都为繁荣使劲，也都接受考验。最厉害的考官是时间，仿佛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么铁面无私，过去十年二十年，现在越来越勤，三年两头的拿颜色给我们看。

看就看吧，若是真情，就经看。

这是韩蔼丽的第一个小说集，她要我写上几句话，我应当写的是祝辞吧。想到祝辞，还是她自己说的好，《湮没》的最后一句是：

“新的一天是明朗的。”

《田园》的结尾是：

“明天我就动身……”

湮 没

我爱他，二十年过去了，这股火焰依然在我心中燃烧着。多么漫长的岁月啊，我颊上的粉红色褪却了，眼里青春的火花熄灭了，银丝已经夹杂进我乌黑的头发，细碎的皱纹不声不响地，爬上了我的额头、眼角、唇边。我早已从一个热情、任性的少女，变成了一个举止规矩、性情相当怪僻的中年妇女。

自从在塞北群山边，那个连地名都不知的小车站分手以后，我就不再把他当作爱人，而且自己觉得心中的怨恨驱走了爱。二十年来，我请求狂风扫荡我的心，我呼唤暴雨荡涤这恋情，我往心中不断地填塞着雪块冰凌，我终于相信自己平静了，忘却了。但如今，我不愿而且也不必再自己欺骗自己，我爱他。然而，事实是，不论是他，还是往事，一切都已消逝，只剩下它们的踪影，刻在心的深处，是不能也无法忘怀的。

昨天，P大学中文系的两个同志，到出版社来找我，问我蔡源的下落，因为要给他改正五七年做的政治结论，需要本人的一份申诉书。可是发了几次外调函，竟然打听不到他现在在哪里。于是从留档的五六年学生登记表的爱人栏里，找到了我的名字，因为我常在报刊杂志上画插图，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我。

我没有回答“你是蔡源的爱人吧”这个问题。只是告诉他们，他已死去，何时、何地、怎样离开这个人世的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五七年以后，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。这以后，关于他的消息，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点点滴滴。当七五年我去内蒙寻找他时，连他的骨灰都没见到，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亲友认领，大概火化后就随便埋掉了，但就连这点，我也终究没有搞清楚。

说是偶然也好，巧合也好，我和蔡源头一次见面相识，最后一次见面分手，都是在火车站上。

一九五五年秋，我十八岁，考上了中央工艺美院。一个人要从我的家乡，浙东的一个小县城，坐乌篷船到杭州，由杭州坐火车到上海，再转车去北京。心里又是兴奋，又是忐忑。因为我最远只到过一次杭州。外面的世界，祖国的山水，伟大的北京，对我都是书本上的故事，别人嘴里的传说，电影或画报上的美丽图画。我就要去到这陌生又熟悉的故事、传说、图画的境界，心中是无限的希望，脑子里是美妙的幻想，它们模糊但却是十分的绚烂。一路上我象喝多了酒似的昏沉沉，而又轻飘飘。父亲舍不得心爱的

独生女远离故乡，一直送我到杭州火车站，开车前还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给我各种叮咛，我只是无心地“喂、喂”地答应着。

我和蔡源相识就是在这个我踏进社会生活的车站上。当时谁知和他相识，竟会在我的生活里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啊。

一个用蓝花土布捆扎的巨大行李包后面，一个轻轻的声音叫着我父亲：“老伯！老伯！”起先我们都没有以为这是招呼我们。于是那个行李卷就放了下来，一个戴眼镜蓬头发的年轻人，涨红着脸正对着我们。他左手费劲地提着一个盛脸盆的线网袋、一个旧纸板箱，胳膊上还挂着个二胡；右手却提着一个女孩子用的花布书包，一言不发地递到父亲面前。我一看，正是我丢失的“八宝囊”，里面有我的画稿，有胶泥捏的小人小猫，有毛线编织的各种女孩子的玩意儿，还有我故乡女友们送的照片、缎带，各种各样的临别纪念品。昨天在旅馆里发现丢了这花书包，我急得跟父亲直发脾气，还哭了一鼻子。父亲还没开口，我已跳上前去，揪住书包带，一把就把我的宝贝书包夺了回来。蔡源看见我这副凶样，忠厚地笑了：“我在船上捡的。我知道是你们的，上岸还追了你们半天……”他不对我却对我父亲解释着。我这才依稀记得一路上，乌篷船头坐着一个青年的瘦削而结实的背影。

大概是因为由华北招生委员会统一买的票，而我们县一共才有三个考到了北京地区，所以火车开动后，当我依

惘若失地目送了越来越远的父亲的身影，回头竟发现这个戴眼镜蓬头发的小伙子，正在我旁边找地方安置行李。想起自己刚才的无礼，我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了笑。他也冲我笑了笑，笑得憨直、忠厚，然而还是不对我，却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问道：

“你考上哪个大学？”

“P大学。中文系。你呢？”

“我们以后是同学了。”

“太好了。我叫王乙。”

“我叫蔡源。”

王乙是个好交际的青年，两只大眼睛对谁都闪闪发亮，很快就把我拉进了交谈的圈子。一路上，我给他们看我的图画习作，蔡源给我们朗诵李、杜、苏、辛，直至海涅、拜伦的作品，王乙则不断地哼着“深深的海洋，你为何不平静……”。车窗外是不断迎面跳来而又随即逝去的祖国山河那美不胜收的景色，它们忽而辽阔、壮丽，转而妩媚、纤细，忽而是奇峰突起，群山竞驰，转而又又是溪水潺潺，三五农家。我们惊讶、赞美、狂喜得长一声短一声地不断叹息。生活啊，对这三个坐在火车上摇晃的青年人，就象我那时的图画，五彩缤纷，光耀夺目，各种彩色塞得画面都象要溢出来。三颗火热的心，三个单纯的头脑，曾经多么热烈地向往着未来，曾经多么赤诚地描画自己的抱负、理想。总以为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人们，都是真的善的和美的，好象我们坐着这列火车，就能一直驰向幸福和光明。

那是我一生中多么美好的时光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虽觉得简单幼稚得近乎可笑，但心的深处，有时真渴望自己又变成十八岁，又在那列好象在驶向幸福和光明的列车上摇晃。

到上海我们就坐上了华北招生委员会为新生包的专车。虽然快九月了，天气还是很热，我想出站去买几根棒冰，但没有来得及。火车离开上海后，我就老是抱怨个没完，王乙就老拿棒冰笑话我，蔡源却始终对我忠厚地笑笑。他们哪知道从童稚时代起，棒冰就是我的魅惑呢？每当我哭闹，父亲就哄我：“乖！下次去杭州给你带棒冰。”当然棒冰是无法带的，小县城又根本没有，所以唯一一次在杭州领教它时，我曾经一口气嚼了二十根。

列车一早从上海发车，傍晚天黑才到南京和平门站，一停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。几百个年轻人的歌声、笑声、喊声、手风琴声，把个僻静的小站掀腾起来了。突然，我们的“专列”长长地吼叫了两声，竟然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启动了。这一下我们在站台上散步的，就全玩开了扒火车的亡命把戏，反正都是身手矫健的年纪，于是各显神通，有人竟在车厢的阶梯上一直扒到下关站。

车开就不见蔡源，心想大概是上错了车厢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到了下关站，还不见他的影子，王乙和我真急了，找了列车员，又找列车长，才知道有至十几个同学被甩在和平门站上了。

火车出下关、过江，整整花了三个小时，我无心欣赏早就渴望的祖国第一大河了。蔡源的二胡在衣钩上一晃一